

必須貫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原則

——評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

古 熔 金

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教科書已經全部出版。這部書在內容安排上，採取以古代文人作品為主，形成一個作品、常用詞、古漢語通論三結合的教學體系。這個體系，比一九五八年以前各綜合大學所編的教材的體系，確實有所改進。但是，這部教科書却有一個非常嚴重的缺點：沒有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原則。現在，我們就這一點提出一些意見，與王力先生商榷。不對之處，請王先生和同志們指正。

在《古代漢語》教科書中，要不要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原則，是一個歷來有爭論的問題。很多同志認為：《古代漢語》的教學是通過作品分析語言現象，不可能在課堂上用很多的時間去分析批判作品的思想內容。因此，在編寫教科書時，就應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的原則，選取古人作品，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對入選的作家作簡要的介紹，對入選作品的內容作簡要的題解，並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原則貫徹到作品的注釋中去。但是，有些人卻認為：《古代漢語》的教學是分析語言內部規律，語言沒有階級性，因此，用不着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原則。王力先生究竟贊成那一種主張，他自己並沒有公開表明態度，但是從他所主編的《古代漢語》來看，他實際上是同意後一種意見的。而我們則和王先生相反，堅決擁護前一種意見，主張《古代漢語》教科書，要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原則。這是因為：第一，《古代漢語》教科書中的“文選”是古代文人的作品。這些作品產生於過去的剝削階級社會，多數是封建性的糟

粕，或者是糟粕多於精華，精華與糟粕同時并存。對這些作品，我們必須“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①。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原則對作家作品作具體分析。第二，我們的社會里還存在有階級，有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既反映在政治經濟戰線上，也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在後一種領域里的鬥爭表現得更為複雜、曲折和隱蔽，而其形式也是多種多樣。其中有一種形式是資產階級利用遺留下來的舊文化與無產階級爭奪思想陣地，向人們特別是向青年灌輸資產階級思想、封建主義思想，妄圖把一部分青年拉上資本主義道路。如果《古代漢語》教科書不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原則，就會精華糟粕不分，使學生在讀古人作品時，受到封建性的糟粕的影響。事實上，《古代漢語》教科書中某些思想內容不好的作品，已在少數同學中發生了消極影響。例如：有同學讀了《論語》

^①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年第二版，第701頁。

后，欣赏孔子的“恕道”，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有同学当他个人主义和周围环境发生矛盾而感到失望时，不检查自己，却到《滕王阁序》中找安慰，大声朗读“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少数同学说什么“古文是浓茶，现代散文是白开水，淡而无味。”这种消极影响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同学中，但若不防微杜渐，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种消极影响，对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起着一定的抵消作用，而其实质则是封建性的糟粕在“合法”地帮助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防止封建性的糟粕毒害青年。否则，《古代汉语》的教学，就会在客观上起到帮助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作用。我们坚决主张在《古代汉语》教科书中，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就是根据上述客观事实提出来的。

从上述客观事实中可以看出：在《古代汉语》教科书中，要不要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是一个带方向性的根本问题，即《古代汉语》的教学要不要担负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说得具体些，则是：在争夺青年一代中，《古代汉语》的教学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青年，还是为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打开闸门，使青年受其毒害，帮助资产阶级争夺青年？既然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为什么王力先生没有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呢？我们看来，根本原因在于：王力先生在编教科书时，没有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应该担负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应该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青年。这样说是否冤枉了王力先生呢？请看事实。王力先生说：“每一门课程都是教学计划的一环，它有它自己的目的和任务。我们在进行某一课程的教学时，首先要搞清楚它是解

决什么的，然后按照这个目的和任务来安排教材和教学。”“古代汉语这一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我们就应想尽办法，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来完成这个任务。”^①我们认为，每门课程除了有它自己本专业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外，都还有一个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的和任务。王力先生上述做法恰恰丢掉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的和任务，而认为《古代汉语》只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只管“专”不管“红”，教材内容也只应根据“专”的要求来编写。此外，王力先生还要学生学习古人的读书方法。说“前人熟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的办法应该认为是优良传统，值得继承下来。”^②“我们应该重视古人的经验，如果依照古人的方法读古书，熟读古文二三百篇，篇篇都能成诵，感性认识丰富了，也可以养成古代汉语的习惯，从而获得阅读古书的能力。”^③我们不笼统地反对学习古人的读书方法，但是反对盲目提倡学古人的方法读古书，更反对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读古书。盲目提倡读古书，只能引导学生埋头故纸堆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这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的背道而驰，那里还有一点要使《古代汉语》教学担负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的影子？正因为王力先生把《古代汉语》教学目的这一重要方面抛到九霄云外，所以教科书中，严重存在没有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的缺点。

^① 王力：《“古代汉语”编写中的一些体会》，《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8日。

^② 王力：《古代汉语的教学》，《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③ 王力：《“古代汉语”编写中的一些体会》，《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8日。

二

教科书中沒有貫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首先表现在古代作品的选择上违背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

《古代汉语》教科书的选文标准，应该是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①按照这个标准，就是要以无产阶级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而以无产阶级政治标准第一来选取古代文人作品。王力先生提出：

“我们的选文标准，应该是思想性和典范性相结合。我们力求做到所选的文章既是思想健康的，又是脍炙人口的。脍炙人口的文章对后代文学语言的影响较大，读一篇胜于读生僻的文章十篇。”^②这里，王力先生虽然也提出了“思想性和典范性相结合”作为选文标准，但实际上他所强调的是文章的典范性，是所谓“脍炙人口的文章”。他认为

“脍炙人口的文章对后代文学语言影响较大，读一篇胜于读生僻的文章十篇”，“读了它们，就能更好地掌握古代的文学语言”。所以“我们要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③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标准。何以见得呢？

首先，请看王力先生所说的“脍炙人口的文章”，到底是“脍炙”什么人的“口”，被谁誉为“脍炙人口”..一般说，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些被人誉为“脍炙人口的文章”，大多数是“脍炙”封建文人、资产阶级文人之“口”，是由封建文人或资产阶级文人在过去的社会里所肯定的，无不反映了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的政治观点和审美观点。按今天的标准衡量，这些作品的思想是不健康的，或者是有毒的。例如教科书中所选的两首李清照的词：《如梦令》、《醉花阴》，都是过去被人誉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但

其思想内容却是花落伤春的感伤情绪，以及贵妇人的相思之苦，充满哀怨、忧愁、寂寞、孤单。人们读后很容易染上感伤情绪，意志消沉，丧失积极上进的革命意志。又如教科书所选李煜的《浪淘沙》，也是所谓“脍炙人口”之作，可是写的却是亡国之君对过去宫廷生活的怀恋和悲苦心情：“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散发着浓厚的没落阶级的颓废情调。正因为李清照、李煜，精神空虚，没落颓靡，有着无限的哀怨，于是写出一些伤春相思，怀恋往昔生活的感伤作品。后世一些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也同作者一样。因此，这些作品中的感伤情绪最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也就最欣赏这些作品，称它们为“脍炙人口”之作。到了今天社会里，一些旧知识分子，多半出身没落的剥削阶级，他们在世界观未改造好以前，其思想感情多少和这些词人具有共同基础。所以他们非常欣赏词中的感伤情绪，也认为这些作品“脍炙人口”。倘若把这些词解释给劳动人民听，或者给经过革命锻炼的干部读，他们会觉得这些词讨厌。上面所举事实说明：文学作品有阶级性，欣赏作品的人也是阶级的具体的人。人们总是以自己的阶级观点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去欣赏作品。所以同一篇作品，在不同阶级具有不同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人看来，有的认为“脍炙人口”，有的则不是这样认为。可见，一篇作品能否被誉为“脍炙人口”，既取决于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871页。

^② 王力：《“古代汉语”编写中的一些体会》，《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8日。

^③ 参看王力：《古代汉语教学》，《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品本身的阶级内容，也取决于欣赏者的阶级观点。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篇章，能被历代封建文人、资产阶级文人誉为“膾炙人口”之作，就是因为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封建文人、资产阶级文人的政治观点与审美观点。因此，当我们谈到“膾炙人口的文章”时，首先必须以阶级观点分析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看它是“膾炙”谁人之“口”，被什么人誉为“膾炙人口”。可是，王力先生撇开这些具体的阶级内容，把“膾炙人口”中的“火”抽象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选过去人们所认为的“膾炙人口的文章”。显然，这与毛主席的指示是相违背的。

其次，请看教科书中所选的“膾炙人口的文章”的思想内容，是不是真如王力先生所说的那样：“所选文章既是思想健康的，又是膾炙人口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教科书中所选文章绝大多数思想极不健康，少数思想内容含有毒素，其具体表现情况可分为六种类型概括说明。（因篇幅所限，故在每一类作品中列举篇名后，只对一、二篇作品的思想内容稍作分析。）

一、描写以“忠”“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的作品。如《汉书·霍光传》、《枚乘·上书諫吳王》、《李密·陈情表》等。《陈情表》是李密用家有祖母必须奉养以尽孝道为理由而呈给晋武帝的辞官“报告”。李密不愿做官的真正原因是怀念蜀汉，家有祖母必须奉养只是借口。但即就这一点说，也无可取之义，且连这一点在文章中也未直接反映。文章所宣扬的是“乌鸟私情”，作儿女子孙的应尽孝道。封建伦理以“忠”“孝”为中心，历代帝王总是以“忠”“孝”麻醉人民。到了今天，那些不甘心死亡的地主阶级还利用“孝道”之名，以修家谱修祠堂的名义进行复辟活动。听说有个人，为了不让儿子离开大城市，离开自己，竟然把《陈

情表》寄给在边疆工作的儿子，要儿子读《陈情表》，从中受“教育”，赶快回家奉养双亲。可见，宣传“孝道”的作品有着多么严重的危害性。

二、作品所极力描写的是逃避现实斗争的隐士生活，赞扬“理乱不知”的隐士，或者是宣扬消极颓废的人生哲学及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如《韓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王勃·滕王閣序》、《谢灵运·登池上楼》、《杨惲·报孙会宗书》。《送李愿归盘谷序》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作威作福、盛气凌人的士大夫的嘴脸，但是作品极力称赞“理乱不知”的隐士，绘声绘色地描写隐士的舒适生活，这在过去不曾起过什么积极作用，现在则更加有害。因为它引导人们不是积极生活，参加现实斗争，而是逃避现实，害怕斗争。《报孙会宗书》宣扬了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虽然；杨惲是用这种人生态度表示对汉天子的反抗，但是它的作用与意义不大。因为反抗的实质不过是原来作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的杨惲，因被贬而感到不能再做大官，于是玩世不恭，感到人生短促，何须“富贵”，还是及时行乐的好。这正是一切剥削阶级都共同具有的颓废思想。这种思想最容易腐蚀人，在今天是很有害的。

三、描写封建士大夫閑情逸致的生活、孤芳自赏的性格。如《欧阳修·醉翁亭记》、《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顾章书》、《刘禹锡·陋室銘》等。《醉翁亭记》描写了封建士大夫的閑情逸致，且在写景敍事中蕴含着抑郁低沉的感伤情緒。因此，所写风景都染上了作者的淡淡哀愁。至于在语言上，作者有意做作，矫柔造作，格调不高。《答谢中书书》、《与顾章书》在语言上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内容只是写山水风景，而所表现的风景之美，又都带有封建士大夫的孤高、閑淡和幽雅的性格特征。它

不能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也不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它只能给人一种恬淡、悠闲的感觉，并使人感受到安逸生活的“乐趣”。人们容易在这种“乐趣”的潜移默化中磨掉革命意志。所以，这些作品的思想是不健康的。

四、描写伤春相思、离愁别绪，充满浓厚的没落阶级颓废情调的感伤主义作品。如李清照的《如梦令》、《醉花阴》，李商隐的《无题诗》，都是伤春相思之作；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玉蝴蝶》，周邦彦的《齐天乐·秋思》、《兰陵王·柳》，江淹的《别赋》等，都是离愁别绪之作。这些诗词内容的特点是凄苦悲凉，缠绵感伤。少数同学读了这些作品，感染了词中的感伤情绪，有的竟然对花落泪，对月伤怀，情绪极为消沉。这种使人意志消沉的作品，怎能是思想健康的作品呢？

五、歌颂帝王贵妃、才子佳人的爱情，描写妇女娇懒神态以及宣扬荣华富贵享乐生活的作品。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吴文英的《鶯啼序》，温庭筠的《更漏子》、《菩萨蛮》，庾信的《春赋》等。《长恨歌》的开头几句虽然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荒淫生活有所批判。但是，更主要的是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所谓“生死不渝”的“爱情”。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情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建立在剥削和荒淫基础上的“爱情”，有什么值得歌颂的？他们的“爱情”越是“生死不渝”，也就越祸国殃民。白居易歌颂祸国殃民的“爱情”，同情唐明皇与杨贵妃，正是他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菩萨蛮》以富于视觉的辞藻写贵妇人梳洗打扮时的娇懒神态，写得浓艳香软，庸俗不堪，完全是统治阶级纸醉金迷生活的产物。《春赋》写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对统治阶级荒淫无聊歌颂备至，并且极力宣扬荣华富贵享乐至上，是一篇道道

地为统治阶级纸醉金迷生活服务的作品。

六、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了显著歪曲，或者是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在今天已成为有害的思想。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苏轼的《贾谊论》、庄子的《逍遙遊》（节录）、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贾谊论》是一篇歪曲贾谊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原因的文章。它把贾谊不得志的原因归结为贾谊不能自用其才，不能等待和容忍。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贾谊对政事的主张不利汉朝的当权派，所以遭到排挤。这种歪曲反映了作者苏轼的政治态度。苏轼也是个经常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但是，他以老庄思想作自我解脱和乐观旷达的精神武器，以“等待”与“容忍”来对待政治上的不得意。这种道家的人生态度使苏轼在分析贾谊不得志的原因上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并且这种态度是逃避斗争的消极行为。它不是引导人们积极进取，而是引导人们向后退却。因此，《贾谊论》不是思想健康的好文章。《吊古战场文》在它产生的时代，对唐玄宗的穷兵黩武的政策是一个谴责，稍有进步作用。但是，这篇文章原来就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为了谴责唐朝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政策，把秦汉以来的战争，不管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一概加以否定毫无原则地宣扬反战思想，尤其，以感伤的笔调描绘战争，把战争写得凄惨残酷，阴森恐怖。战争是剥削制度的产物。统治阶级或外族侵略者，为了满足剥削与掠夺的慾望，硬把战争强加于人民头上。人民为了反抗压迫与剥削，为了祖国的独立与民族生存，不得不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这种笼统反对一切战争的作品，在今天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已变成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东西了。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王力先生把过去封建文人、资产阶级文人所认为“脍炙人口的文章”，当作符合“思想性和典范性相结合”的文章，于是大量选取，结

果选了许多乌七八糟的封建糟粕。这从表面上看来不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来选文，但其实质还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来选文的，只不过这个政治标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毛主席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①被封建文人或资产阶级文人所称为“膾炙人口的文章”，首先是因为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艺术性也符合他们的审美观点，才得到“膾炙人口”的“美名”，认为有“典范性”；把它们选入《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观止》。象晚唐时期罗隐、陆龟蒙、皮日休等作家所写的揭露统治者残酷剥削人民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艺术成就不错，但因思想内容不符合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所以既不称它为“膾炙人口的文章”，更不选入《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观止》。王力先生只选封建文人所认可的“膾炙人口的文章”，把封建文人不认可的文章，一律斥为“生僻”的文章而不选，这难道不是以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作选文标准吗？思想性和典范性都是具有阶级内容的概念。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具体分析。只有那些符合无产阶级政治利益的作品，我们才说它有思想性。那些符合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作品也有“思想性”，但那是应该排斥的封建主义“思想性”，或资产阶级“思想性”。对“典范性”也应以阶级观点作具体分析。历史上没有各个阶级一律承认的典范性文章。各个阶级都是根据自己的阶级观点和政治利益的需要来确定哪些作品是典范，哪些作品不是典范。因此，各个阶级对于文章首先是检验它的思想内容是否有利于本阶级，其次才考虑它的艺术性和文学语言等问题。

王充的一些具有战斗性的唯物论文章，艺术性不低，语言词汇丰富，语法合乎规范，而历代统治者斥为异端，认为不典范。原因在于王充的唯物论不合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利益。表现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作品，如宋朝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陈亮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古文观止》的编者认为不“典范”，统统不入选。伪托之作的《李陵答苏武书》；艺术性差，语言运用不高明，且内容是李陵为自己屈节投降作诡辩。可是，编者却把它当宝贝，选入《古文观止》作“典范性”文章。编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清王朝的政治利益服务，压制汉族人民的反抗，消灭汉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并为投降到清王朝作汉奸的人作辩护。所以在封建阶级看来是典范性的文章，在无产阶级看来就不一定都是典范性文章，这是非常自然的事，也应该是这样。否则，就是抛开无产阶级观点跟着封建文人亦步亦趋。现在，我们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出正确分析，并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实践的需要来确定哪些作品是典范，哪些作品不是典范。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种，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仍具有某种积极意义或借鉴作用；第二种，作品在艺术上语言上有较高成就，所表现的思想在历史上虽不反动，但也沒有积极意义，在今天则有消极作用；第三种，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某种进步意义或积极作用，但在今天已经成为无益有害或者反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第二版，第871页。

的东西了；第四种，作品对现实的描写有显著的歪曲，或者反映现实不深刻；第五种，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和观点，在它产生的时代有某种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压迫与剥削劳动人民、麻痹劳动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第六种，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完全为封建阶级服务，在政治上根本反动。

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实践的需要，我们认为只有在第一种作品中，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仍具有某种积极意义或借鉴作用的作品中，选取那些艺术性较高、文学语言甚好的作品，作为《古代汉语》的典范性文章。这一种作品所包括的内容是：一、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拥护正义战争，谴责非正义战争者；

二、揭露统治阶级政治上残暴黑暗，生活上荒淫无耻，以及同情人民疾苦，提出改革社会弊政者；三、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者；四、歌颂劳动人民智慧及其优秀品质者；五、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或朴素的唯物论的文论、政论、寓言故事，且于目前现实有一定借鉴作用者；六、描写祖国壮丽山河，或反映劳动人民真挚爱情，且于目前生活有积极意义者。总之，典范性文章的内容应该是：在今天还有积极意义的“古代优秀的人类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古代汉语》的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服务。

三

教科书中没有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之处，还表现在作家小传和专著评介上。

在编写《古代汉语》教科书中，正确而简要地将作家创作思想及创作活动加以介绍，或者如王力先生所说的写成作家小传及专著评介①，可以帮助学生认识作家的阶级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从而正确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是，倘若介绍得不正确，或对作家作品作了不适当的评价，便会模糊学生对作家政治态度的认识，不能帮助学生正确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因此，在作家和专著的介绍中也应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王力先生在这方面做得怎样呢？在我看来，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只介绍作家的生平，不介绍他的创作思想，或者只介绍作家进步的一面，不介绍他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对贾逵、枚乘、邹阳、杨恽、李密、陶弘景、吴

均、杨雄、王勃、韩愈等人的介绍就是这样的。如对韩愈的介绍是：“韩愈早年不得志，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才被节度使董晋征为属官，后来累官至吏部侍郎。中间曾几度被贬。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在监察御史任时，因天旱人饥，上书请求缓征徭役租税，得罪了京兆尹李实，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在刑部侍郎任职时，又因谏迎佛骨，触怒了皇帝，被贬为潮州（今广东丰顺、揭阳、潮阳）刺史。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主张文章要阐明孔孟之道，以此来反对当时单纯追求形式的骈文。这些，对当时的文坛以及后世的散文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编者简直把韩愈介绍成站在与封建统治者相对立的立场上，专门为

① 参看王力：《“古代汉语”编写中的一些体会》，《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8日。

民請命的人物。其实，韓愈是个极力主张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秩序的人物。这一点在他的《原道》篇中有详细论述。他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于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于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则誅。”韓愈这段论述的实质是：皇帝拥有无上权威，任何人都得驯顺地服从他的统治和剥削；各级官吏则应尽力帮助皇帝统治和剥削人民；人民则必须生产各种物质养活皇帝和他的官吏，否则就要砍头。这是何等反动的理论！并且他说：“博爱之谓仁”，这实际是要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都互相亲爱，不要斗争；又说：“行而宜之谓之义”，这实际上是要社会中的所有一切阶级一律按封建制度办事，不得越軌行动。这种理论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比前面所引那一段话更反动。对韓愈这反动的一面，编者根本不作介绍，只谈韓愈提倡古文运动和反对统治者过份剥削人民的具有进步的一面。对于韓愈提倡古文运动的功绩也要作具体分析。韓愈把“文体”从骈俪的形式主义文风中解放出来，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韓愈的提倡古文，是以复兴儒学为目的。他要用古文来载“圣人”之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①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文，却又走了摹仿先秦散文的另一种形式主义的道路。不敢用接近人民口语的新的文学语言来创造新的散文。这些我们都应适当地指出来，否则，对韓愈的古文运动的介绍就不全面。总之，封建文人归根结底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即使是最进步的封建时代作家，也因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他们的思想中无不出现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的矛盾现象。如果只介绍进步

的一面，不介绍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其结果必然美化了封建文人，模糊了阶级界线。

第二，对作家落后、保守、反动的一面虽有介绍，但抽象空洞，对其进步一面则具体充实。介绍班固、沈约、欧阳修、苏轼等作家就是如此。例如对欧阳修的介绍，仅说他在晚年时，采取保守的态度反对王安石变法。对其进步一面则大加介绍，说“欧阳修出身较寒微，对人民疾苦、社会弊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居官时曾提出许多改革时政的主张，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其实欧阳修在他晚年时，不仅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且对以贝州王则为首的农民起义，抱着敌视态度，主张坚决镇压。对欧阳修这些极为反动之处，编者只字不提，这那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呢？

第三，对作家的政治思想及其作品毫无批判，全盘肯定。如介绍《论语》、《孟子》、《韓非子》、《诗经》，以及柳宗元、白居易等作家时，都是全盘肯定。对孔子思想的介绍是：“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他主张把‘仁’这一精神贯穿到各个方面去。在个人修养方面提倡‘克己’，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提倡‘爱人’，在政治方面提倡‘仁政’，‘仁’就是孔子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对孟子的思想介绍是：“他提出了‘民贵君轻’，对人民作一定的让步，反对掠夺性的战争等主张，他以‘平治天下’为己任，游说诸侯，反对‘霸道’，提倡以‘仁’‘义’为中心的所谓‘仁政’，‘王道’”。

上述介绍，用的完全不是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法，而是单从字面上，不管阶级内容的做法。我们认为孔子的“仁”有强烈的阶级性，是从他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利益出发，

① 韩愈：《答李翊书》。

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所说的“己”和“人”都是剥削阶级的“己”和“人”。它绝对不包括“我不愿意被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的意思在内。樊迟向孔子“请学稼”，孔子骂他是“小人”。可见，孔子极端轻视体力劳动，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办事：“我不愿干的体力劳动，也不加给别人。”可是，孔夫子还是要吃饭的，于是就又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就是要用“礼、义、信”这套封建伦理规定老百姓才应从事体力劳动，种出庄稼养活自己。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完全是对统治者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说的，目的在于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从而巩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地位。若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说，那就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或者“我有所欲，人必从之”。至于“仁者，爱人”；或如编者所说“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提倡‘爱人’”，则是一方面要“君惠、臣忠、父慈、子孝”，也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另一方面则用所谓人类之爱，调和阶级矛盾。毛主席早就说过：“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①编者这种抽象地介绍提倡人与人之间相爱，在今天修正主义用资产阶级人性论腐蚀革命人民思想时，是十分有害的。对孔子提倡“仁政”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不否认孔子反对暴政，对人民有好处。但是，孔子提倡“仁政”，主要是要统治阶级通过“礼”“乐”，用

封建伦理教育人民，使人民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人民都“不犯上”，服服贴贴地受统治。正因为孔子的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便被统治者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早在“五四”时代，先进的知识份子就对孔子作了批判。到了今天，却有人抛开阶级观点毫不分析批判地介绍孔子，豈不是“倒退到了五四运动以前的状态”？

关于孟子的“民贵君轻”，实行“仁政”的思想，我们不否认其历史作用。但是，在肯定其历史作用时，应指出其阶级实质。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可见，孟子把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看成是永恒的社会秩序，也把老百姓当作统治的对象、剥削的对象。怎样维持这个“永恒的秩序”呢？如何才能拥有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呢？孟子的方法是：一、反对“杀人盈城”的战争。因为老百姓死光了，怎能“治人”呢？二、缓和老百姓的反抗与逃亡，让他们安心生产。“黎民不饥不寒，天下之民至焉”，以便统治者拥有更多的老百姓让统治者剥削与统治。三、要统治者懂得黎民“无恒产因无恒心”。所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以便麻醉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好让统治者牵着老百姓的鼻子跑——“驅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②封建思想家的孟子所提倡的“仁政”，就是这样从根本上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的。这种说法是否对，还可以讨论。但我认为星宇同志在《论“清官”》一文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它的存在是以农民的存在为前提的。校有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2页。

^② 引文均自《孟子》。

见的封建政治家和封建思想家完全能理解这点。有名的“好皇帝”唐太宗说：“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地主阶级之所以重视农民，正因为只有农民，才能够载负起或者颠覆掉封建统治的巨舟。”①正因为怕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所以历史上有些皇帝和如本教科书所介绍的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等官吏，能在一定范围内减轻农民的赋税，比较注意农民的疾苦，甚至与过分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阶层进行斗争。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防止颠覆封建巨舟的

措施，并不是真正为了农民。如果农民把希望寄托在为他们减轻赋税的官吏身上，那是要落空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我们今天不以阶级分析法指出上述做法的实质，而只谈他们实行“仁政”，就会模糊学生的阶级意识，不是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所以，在《古代汉语》教科书中，万万不能忽视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对作家进行批判性的评价。

四

在《古代汉语》教科书中，即使所选作品都是古代伟大的进步作家，但因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他们的作品也不免混有封建糟粕，精华与糟粕往往同时并存在一篇当中，不能象切西瓜一样，截然分开。所以，在编写教科书时，就应对所选的作品作出简要的分析批判性的题解，帮助学生识别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防止学生受糟粕的影响。王力先生主编的教科书，选了许多充满封建糟粕的作品，则更应作出分析批判性的题解。然而，教科书中的二百三十余篇作品，作了题解的只有一百三十余篇，而且这些题解多数是以十几个字客观地介绍作品内容，几乎完全没有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现在，抄录几条如下，以见一斑。

1. 《赵威后问齐使》的题解是：“本文写她的政治见解，突出了她的民本思想。”什么是民本思想？赵威后的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什么？编者没有说明。对于任何思想都应根据阶级观点放在历史事实中进行考察与分析。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引起农民不断逃亡与反抗；又由于战争频繁，死了不少农民，以致发生劳动力不足现象。没有劳动力，统治阶级从

哪里榨取物质财富？因此，统治阶级不能不考虑农民的作用，不能不改进对农民的统治办法。这些就是形成民本思想的社会基础，而民本思想的实质则是统治阶级为缓和农民的反抗与争取劳动力的工具。赵威后说“苟无民，何以有君？”实际上是沒有民她儿子就做不成统治者，她也就做不成威后，并且沒有民，也沒有可以剥削的劳动力，所以她要重民。当然，威后比之那些残暴之君要好点，但也不要因她说了几句“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的话，就看不到她与人民是根本对立的。她与陈仲子还有那么深的矛盾，更何况与下层庶民呢？因此，要以阶级观点分析赵威后的言行，不要抽象地说：“本文写她的政治见解，突出了她的民本思想。”

2. 《冯谖客孟尝君》的题解是：“本文写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为他出谋划策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战国时代的一些门客，为了自己的名利，拼命为统治者服务，甘当统治者的帮凶。冯谖就是这号人物的典型。他为了一鱼一车，耍了许多花样，一旦得到

① 星宇：《论“清官”》，《人民日报》1964年5月29日。

了，就向人炫耀：“孟尝君客我”。而当孟尝君满足了他更高要求，就用烧债券收买人心的办法为孟尝君服务，用欺骗人民麻痺人民的办法为孟尝君巩固统治地位。对冯谖这些行为都应在作品题解中有所批判。

3. 《晋灵公不君》的题解是：“本文着重表彰了敢于直谏，忠于国事的赵盾。”我们认为：本文真实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迫害，暴露了晋灵公的残暴。这才是作品的主要内容，编者所写的那是次要方面。本末倒置，怎能引导学生认识这篇作品的内容呢？

4. 《楚辞·渔父》的题解是：“本篇表现了屈原不愿同流合污，宁愿‘伏清白以死直’的高贵品质。”无可否认，这篇作品的确表现了屈原的高贵品质。但是，对于屈原所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应在肯定其历史作用的同时，恰当地给予分析批判，指出这种忽视人民力量的态度，在今天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另外，渔父的隐士态度：“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也应予以批判。因为这种在天下混乱之时我就避世的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虽然也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反抗，但其作用却是适得其反：引导人们逃避现实，麻痺人民斗争意志，结果帮了统治者的忙。

除上述情况外，教科书中还有八十九篇作品与《论语》全部选文未作题解。何以会如此？原因在于编者认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原则对作品作批判性的题解，是不足轻重之事，可作也可不作；即使作，也不必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这样说是否冤枉了编者呢？事实胜于雄辩。在这部教科书的《初稿》中，作品的题解叫作“说明”，附在作品之后。“说明”的内容除了简单介绍作品内容外，还有简要的分析批判。本来这种作法是很好的，可是到了公开出版的教

科书中却取消了，改成只在作品注释中对作品内容稍加介绍，并且抽掉了原已有之的分析批判。如《初稿》对《晋灵公不君》的“说明”是：

“作者揭露并谴责了晋灵公的残暴，表彰了敢于直谏的赵盾，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但他赞扬赵盾、鉏麑的愚忠和灵辄的报恩思想，称颂了所谓‘良史’，则是应该批判的。”

到了定稿中，这个“说明”改成：“本文着重表彰了敢于直谏，忠于国事的赵盾。”把原已有之的分析批判不要，并且本末倒置地介绍作品内容。这豈只是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作题解，简直是要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我们认为，必须恢复《初稿》中在作品后加“说明”的做法。这“说明”的内容应该是：一、简要地介绍作品内容；二、指出作品的思想在历史上的意义或作用；三、扼要地分析作品思想上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指出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意义或作用。

另外，在文选的注释中，也应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在这方面，教科书做了一点。如对《论语·颜渊》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语，注释说：“这两句话反映了宿命论观点。”这种加批判性按语的做法是很好的。但是，编者在很多也应这样做的地方不但没有做，而且还离开作品的思想内容专从字面上注释词或句的意义，因而出现一些超阶级的观点和混淆阶级界线的错误。例如：《论语·微子》中“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一语，注释为“想使自己身子乾淨，却乱了大伦。伦，人伦，古代社会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封建统治阶级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封建伦理，这正是封建地主阶级从他们阶级立场出发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

正常关系”，实际上是统治人民维护封建制度的“野兽法律”。怎能把封建伦理不加批判地说成“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呢？又如对《冯谖客孟尝君》中“子其民”一语，直译为“就是把薛地的人民看成自己的子女。”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①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说他们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子女，“爱民如子”。这是地主阶级为夺取劳动力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而作出的伪装。编者这种直译

不但混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界线，而且抹煞了“子其民”一语的阶级内容。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且同一字眼、同一名词在人们具体运用时，往往反映着不同的内容、甚至相反的内容。因此，在注释文选中的词汇意义时，千万不能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指导作用，也不能离开作品的思想内容专从字面上注释词汇意义。

X

X

X

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开始于1961年5月，最后完成于1964年5月。在这一段时期里，国内外的阶级斗争都很尖锐复杂。这种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编者的思想中：是坚持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时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编写教科书呢？还是按一九五八年以前的老办法编写呢？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古代汉语》也必须担负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还是只去培养学生阅读古书能力呢？编者都采取了后者，并且在公开出版的教科书中，还要把初稿中原已有之的批判分析性的“说明”取消。总之，在《古代汉语》中，不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以什么态度对待文化遗产，要不要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是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问题。因此，我们认为王力先生主编的

《古代汉语》存在上述缺点，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从这部教科书中应该吸取教训：即当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时，如不站稳立场，加强“兴无灭资”的斗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冒出来，以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与治学态度、方法来编写教科书。所以，我们从事古代汉语教学的同志，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真正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在任何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都应明辨是非，识别方向，坚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编写教科书。

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而共同努力，真正把《古代汉语》教学中高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旗帜吧！

1964年11月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72页。